

The Philosophical Impetus of Marxism's Dissemination in China

Hejiao YANG^{1,a}

¹Academy of Marxism,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a406297212@qq.com

ABSTRACT

View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its ideology and culture, Marxism's dissemination in China, in a certain sense, reflects people's implicit manners of grasping ideology and culture. These manners include the mode of promoting cultural enlightenment with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subject, the way of realiz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with the self-contradi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subject in relational being, and the method of consciously motivating cultural innovation with the paradigm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other words,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containing an outward growing power of people'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bout themselves and towards the world, ar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urvey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 since modern times.

Keywords Marxism's dissemination, philosophical impetu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的哲学推进力

杨赫姣^{1,a}

¹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6
^a406297212@qq.com

摘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从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式来看,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人把握思想文化的内在方式,其中包括以思想主体的自我认知推进文化启蒙的方式,以思想主体的关系性存在的自我矛盾实现文化融合的方式,以思想文化的范式自觉推动文化创新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内含着人面向自我与世界哲学思考的向外生长力,是审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历程的重要根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 哲学推动力; 思想文化转型

1. 前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在热切寻求救国之路时结实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代表了思想文化以先进性的要求开始了改造自我的现实革命。马克思主义最终融入中国的社会革命体现了“思想主体面向启蒙”、“思想主体关系性存在中面向矛盾”、“思想文化本身面向范式自觉”三种推进力。

2. 思想主体面向启蒙的推动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迅速传播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占据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更是中国人在思想深处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自我启蒙的真实反应。新文化运动之前,漫长盘旋的封建制度风俗、文化礼俗缠聚成为中国人的价值核心,更在官僚政治以及独尊儒学的文化传统中禁锢了对自我思想的寻求,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人曲折结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不断在理论与革命需要的结合中进行思想的自我把握。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代表中国人不断在自

我需求之中决断启蒙方向与前进道路的经典。在这段历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凸显出在自我决断中不断突破传统、不断暴露问题、不断创造条件，使马克思主义的推行既符合历史逻辑，又是人本身面向自我启蒙的内在逻辑。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回了“安身立命”，找回了中国人应有的对自我思想的把握和认同，找回了从救亡思想意识到救亡民族真正的革命方法。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很多积极的尝试，“从新实在论到尼采主义、国家主义，从伯格森、倭铿、杜里舒以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到旨在救治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社会主义学说……都曾化为众多中国人的言谈和文章。”^{[1] (P394)} 各种“主义”的纷至沓来一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自我革命的高潮部分，但这些“主义”从传统文化之中开出的逻辑与科学之实用方法难以适应文化自觉发展的真正需求。面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新势力，中国人的文化反思最初是非理性的。直到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它关键性的启蒙了我们要革命化的改变现存事物。正如马克思所总结：“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 (P527)} 当以革命性的思维开始面对思想主体的内在需求时，中国人也就开始了努力通过现实的力量实现思想中的这种转变。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的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3] (P15)} 马克思主义以革命化的理论内核唤起了中国人面对自身启蒙的实践在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逐渐明确的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极大的发展。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情，并合理的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以此确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然而这一时期零散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关于经济的理论以及其中蕴含的唯物史观等理念已然无法满足中国革命积极进取的时代特征，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介绍的时期进到实行的时期。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诉求而言，它建立在对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变革的规律性总结之上，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形态的演变中存在着差异，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适用于以政治革命、生产方式变革等方式改造社会形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大众化的传播以及话语建构，进一步加速了这一时期社会革命的脚步，社会革命第一次深刻的在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下实现了伟大的运动的前提准备。从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这段历史来看，人面对自身的启蒙关键在于把握革命的实践在场的重要性，在对自身启蒙的实践语境的认同下，才能够进一步以思想理论、文化创新指导中国社会变革实践，取得历史效用。而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我们看到了

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或多或少的表达了中国人试图改良文化的自身意愿，但尤其重要的是我们的接受能否并实际的创生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将中国的思想大局引向通达的道路。

当中国人面对实践的在场，也就是革命的必然的外部条件以及形成革命的必然的内部动因的集合，才能够真正发现革命的前提。我们所要实行的社会革命并不是一场理论上获胜而在现实中得不到变革的社会革命，而是要强调理论或思想文化的指引之处正是引起现实发生变革的内在动因。革命化的改变现存事物的重要依据是思想文化所表现出的社会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恰恰引起革命性能够成为有效凝聚中国人自身启蒙要求的思想理论，当抱有这一的意图开始面对社会革命的内在需求时，中国人也就开始努力的在自我思想把握和认同中获得了现实的力量。

3. 思想主体关系性存在面向矛盾的推动力

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中国人在思想文化领域与他者展开正面相较，思想文化的自我革命以更加直接、深刻的方式探索了关系性存在的矛盾问题。从“全盘西化”走出的文化开明，再到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带来的极大影响，文化的觉解以力图实现文化的实用功效为目标，在中国文化的内向性中完成了社会革命的重要思想依据，反映了社会革命所要变革的人的关系性存在的实践基础。但这种实践的基础首先来自于文化差异性中寻找到的最恰当的根基。

事实上，人们总是试图通过打破思想文化中的固化来化解际遇中的矛盾，19世纪初人们对于“进化论”的热衷谈论正基于此。中国近代哲学中出现的“进化论”理论可以说一时间成为了打破长久固化文化关系的思想“武器”。进化论的引进历程中也反映了人们企图在异质文化的刺激中形成关于社会发展的新型理解。因此当严复等人实际的向国人介绍“进化论”之时，其中蕴含的重要的动因必定是面向文化矛盾的关系性存在的真实思考。当严复等人实际的向国人介绍“进化论”之时，其中蕴含的重要动因是面向文化矛盾的关系性存在的真实思考，即不单纯以科学介绍的意图强调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是以敲打沉重思想传统为根本目的矛盾性思考。在思想文化的转变路途中，关系性的文化比较是人们自觉思考的重要表现，即一方面强调面对差异性的文化是思想的关系性存在的前提，明确了需要通过文化辩择的现实运动夯实自我思想发展道路的问题；另一方面思想主体的关系性存在是面对具体历史时空的现实存在，文化能否适应当下人的思想程度与现实情况的契合也成为文化体现关系性矛盾的重要根据。因此文化的进步总是体现了自我文化与异己文化的合理统一，文化选择总是反映了存在现实与人的愿望的合理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化中可借鉴的“武器”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中国封建思想中的“天”、“道”这些看似无法撼动的东西，也反映了一定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要想在思

想文化内部实现重大转机仅仅通过外在形式上的比较与吸纳几乎不可能,更需要从推动思想文化走向的人们的自身境遇中进一步觉解自我是关系性的存在,并不断寻求关系中有效发展的内在动因。而这其中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化关系能够推进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这种文化关系能不能面向中国人自己的矛盾问题本身?而这些疑问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到来得到了相应的化解。

20世纪初的中国以开放的姿态积极的接受了各种途径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多种路径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对中国来说一定的优势,因为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博取众长,通过比较、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现自我文化发展的满足,并且在这种开放的关系当中有利于明确了自我文化关系的真实需求。因此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在早期,一方面依赖于文化的关系性存在,马克思主义强调人能动的认识世界源于对世界统一性的深刻认知,世界的统一性必须基于客观实在性的物质,这就意味着在看待任何现象时,包括文化现象都必须基于客观实际,而这种客观实际反映的恰恰是作为关系性存在的文化发展语境。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之下,面对各种各样思潮的正面冲击,在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的发展寻定位发生过多次转变,从“保守主义”到“全盘西化”再到“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直到“中西会通”,越来越体现了关系性存在的本质要求,即打开关系的绝对对立走向关系的相对和谐,而这正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化领域的精神担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创造了关系性的存在。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更鲜明的旗帜,体现出了通过文化关系的链条创造关系性存在的实践作用。

在这一历程中不难发现,中国革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并不是采取文化整合的简单形式,而是更加深层的探寻了思想文化发展的有机方式,也就是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识。文化主体发生变化同时意味着在面对自身境遇过程中逐渐明晰的身份感与文化价值认同;文化主体的突出,也更加鲜明的展现了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这一事实需要放在哲学思考中加深考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理论生命力以一种逻辑事实与实践事实的双重尺度展现了其深远的影响与发展必要。因此只有当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一种需要超越文化形态而体现文化的内在关系性需要之时,文化形式的外在形式才可能发生实质的内在转变,而从人的文化关系性、生存论关系维度加以理解恰恰反映了彻底需要革命的自我导向与社会革命的实践导向的有机统一,而这其中我们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真正理解为是“真正的理论自觉”。

4. 思想文化面向范式自觉的推动力

任何理论都必然以“范式”成为可描述的思想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以创

新方法、追求正道、发展范式的方式推进了自我思想文化的自觉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整体事实来说,中国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站在了接纳外来文化的立场而丰富了文化传统,更站在了现代性的立场形成了创新、建构的文化范式。在文化传统方面,正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民族特点、现实问题的积极融合,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这种传统与中国自有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相分离,而是起到了相互支撑,“魂与根”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现实特征,更能够将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底色彰显出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属性中蕴藏着推进思想文化面向现代性的范式自觉,这种自觉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源。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在逐渐明确思想文化面向实践、面向理论自觉的前提下,加强把握思想文化理论发展逻辑和内部成分,中国的社会革命在反复实践与思索之后都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范式,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的自觉与创新不仅仅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自我立场上做出合规律的正确诠释,更加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上做出合目的的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文化思潮的碰撞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化学反应。思想文化的相互阐释打通了理论探索在关系维度中的凝固,有利于凸显中国人自己的文化选择。马克思主义在不断的历史延展中进一步深化了与他者的关系,也更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广泛的视野。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伸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相互结合的立体空间,在当代越加凸显思想文化范式的自觉建构的成熟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总是以不断修正自身的有限性体现对“更好的”、“向善的”与“现实的”统一追求,实际上就是强调了思想文化“是以它‘过去’为基础、‘现在’为问题源和背景、‘未来’为本位的统一过程。”^{[4] (P24)}理论精神的时代形象与理论发展的生命力总是交相呼应,正如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5] (P199-200)}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不断反思与创新发展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在规律。对马克思主义的持久探索推动了中国人从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角度对革命的自我形态进行自主的确立。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伴随着中国人的精神的现代性,实现了社会革命的问题语境与自我革命的创新语境的积极融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代认识中更加自觉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实践维度的真正意义。

同时也应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文化立场的出场加强了文化发展的实践规律,同实践本身一样,文化的发展也必然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而进一步上升到新的实践再认识,实践、认识、实践、再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真谛,也是思想文化发

生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体现了思想文化本身的实践经历,这种经历的内在逻辑深刻的推进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考,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求解决理论本身与实践要求如何结合的现代性问题,就是要在现代性思考中凸现代性的方法论自觉,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现代性的方法中体现推进理论自身发展的主体自觉。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如何觉解这种自觉最重要的就是合理运用哲学关怀的时代共性与问题个性,认真甄别与考量适用于、根植于、发展于中国社会的最合理的理论,这是思想理论能够久而久之成为精神家园、创造美好精神世界的可持续动因。我们不仅需要事实的层面叙述马克思主义传播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树立文化自信的伟大意义,更加应该在此过程中清楚的看到今天仍然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当代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积极的传承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方法与精神追求。而实现这一追求的根本途径就是文化内在革新的推动力的不断衍生。

5. 结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以时代精神的不断追问及追求为重要推进力的,而这种推进力体现了哲学层面的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关键路径,对我们今天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肯定到发展再到创新,始终与社会革命与思想的自我革命息息相关,也始终保持着不断关照现实的理论状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应被赋予更加深远的研究意义,因为它不仅代表了文化领域的交融,更加提示着中国人在面对自我启蒙、多重关系、自我文化形象时需要不断追溯的源头。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其现实意义需要加强何以推进这种现实意义的内在根据的积极探索,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的探讨赋予哲学性的反思,将思想文化的内在品格追求纳入历史性参考不失为一种必要的解答。

基金项目

本文为 2021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科技创新项目(3132021321)阶段性成果之一。

REFERENCES

- [1] Chen XL. Metabolism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2] Compilation Bureau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I.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3] Compilation Bureau of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r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enin: Volume 27.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 [4] Ding LQ.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confidence.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2018 May; 1002-3976.
- [5]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irty lectures o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Beijing: Learning Press; 2018.